如何正确看待康雍乾盛世

周思源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先生，咱们先鼓掌欢迎近几年随着清廷戏的不断热播，不论台湾那边拍的《戏说乾隆》，还是我们内地的《康熙微服私访》，一直到最近几年，以正史剧面目出现的《康熙皇帝》、《雍正王朝》，使大家提升了对清朝历史和清代皇帝的浓厚兴趣。学界关于如何认识清朝历史也是有不同的看法，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在国家图书馆给百名省部级干部讲座的时候，题目就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在充分肯定康雍乾盛世时也指出了它“沉沦”的原因。不久，周先生就在《中华读书报》上著文与戴逸先生提出商榷。周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觉得称康雍乾“之世”好像更正确。在之后又不久，有一位姚小平先生再次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与周先生再商榷。我想文学馆这个地方，是一个自由的学术论争的讲坛，我们今天先把周先生请来，请他来谈一谈，他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的。大家欢迎。

中华读书报 2002 年 3月 21 日一期的“文史天地”版刊登了《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以下简称《沉沦》）一文，我有些不同看法，6 月 19 日该报发表了我的《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与戴逸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商榷》）。7月 17 日该报刊登了戴逸先生《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一文（以下简称《怎样》），后来又有别的学者参加争论。由于报纸上篇幅有限，未能展开。今天我稍微多说几句。

“康乾盛世”的提法由来已久，有时也叫“康雍乾盛世”，不过用得较少。一是“康乾盛世”是两个双音节构成一个四字结构，比较顺口；更主要的是，由于雍正皇帝一直背着窃诏篡位、弑父屠弟的恶名，所以尽管雍正夹在康熙、乾隆之间，“盛世”却很少有他的份。虽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等人和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等早已开始对

此质疑，但直到 20 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旅日历史学家杨启樵先生多次赴台湾故宫博物院，查阅了二万多件康熙朝尤其是雍正朝的密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八十年代初出了一本《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1]，才算把雍正的案彻底翻了过来。从此“康乾盛世”就称作“康雍乾盛世”了，不过人们习惯上有时仍然叫它“康乾盛世”。

清朝（1644—1911）三百六十八年总共十个皇帝，位居第二、第三、第四的康雍乾三帝就占了整整一半一百三十四年。其中康熙在位长达六十一年（1662—1723），雍正在位十三年（1723—1736），乾隆长达六十年（1736—1796）。乾隆禅位于儿子嘉庆皇帝后仅仅四十四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处于被列强不断侵略、割地赔款、任意宰割、几乎被瓜分的危险之中，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因此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我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首先就要认真研究被称为“盛世”而且占整个清朝一半的康雍乾三朝。

我的基本观点是：并不否定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功绩，但是不赞成现在依旧把康雍乾时期说成是“康乾（或康雍乾）盛世”，尤其不赞成对康雍乾之世作过高的评价。简单地说，我和一些学者的分歧不是对康雍乾三朝的肯定还是否定，而是评价的高低。因为批评“盛世”不等于否定三朝，肯定三朝也不必非评为“盛世”。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认真总结康雍乾三朝的得失，尤其是其失。正确认识康雍乾之世的得失，有助于加快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我讲三个问题。

一、康雍乾三朝的历史贡献及其和汉朝、唐朝的比较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都很有作为，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其中康熙的贡献最大。三朝先后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了准噶尔部、回部、罗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康雍乾三帝最主要的功绩是将汉朝、唐朝、元朝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由于清朝是人数很少的满族统治全国，它必须

更多地依靠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和它一起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而且它必须努力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才能缓和与汉族的紧张关系并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康雍乾三帝和此前的顺治等对加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加快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一系列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将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的土官土司改为由朝延任命有一定任期而流动的官吏。这项工作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就开始做了，废除土司，设贵州布政使司，置思州、思南等八府。但真正大规模进行是在清朝的雍正时期。雍正皇帝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在云南、贵州原土司统治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一样的政治制度，如编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组织乡勇等。从而大大加强了从中央到省和州县各级政府对这些民族地区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过去在不少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老百姓的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只不过是某个头人或土司的人。因此容易被人利用，发生动乱。“改土归流”之后大大加强了这些地区人民的国家意识（“我是大清国人”）、统一观念（“某地是大清国的某省某州某县”）、大民族归属感（“我是大清国或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某族”）以及地域归属感（“我是中国某省某州某县的人”）等民族文化心理，而不是过去那样，“我是某族某部某头人或某土司的人”。因此极大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边远地区的管理与开发，促进了多元的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至于戴逸先生在访谈中提到的其他几项，按照比较历史学的观念，即不仅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比，将对象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还需要透过表象进行实质比，则颇可商榷了。

戴逸先生强调，“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这与传统观点不一样。”他认为康雍乾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理由是当时中国人口已有三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沉沦》）我认为这样比较有些简单化。西汉（公元前 206 年一公元 23 年）的下限距康雍乾时期（1662—1796 年）的上限相差一千六百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唐代（618—907 年）的下限距乾隆末年也将近九百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生产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口自然也大大增加。单纯从“养活三亿人口”的角度说“中国在康雍乾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兴旺发达的国家”，而且已远超汉唐，是缺乏说服力的。汉朝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比，相当于今日的美国或欧盟。而康雍乾三朝无论是哪一个，在当时的世界上都不具备这么领先与强大。而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之强大独一无二。且不说唐朝极盛时期的疆域西部直达波斯、阿富汗、今中亚各国，东北到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北边达到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和外兴安岭以北的鄂嫩河，南边到今越南的河内一带，国土面积几乎比现在大一倍。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据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上册引用《通典·食货志》记载的资料，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仅河南道与河北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存储的粮食就超过四千万石。加上全国其他地方的存粮总数达到九千六百万石，这还不算老百姓家中的存粮，而当时全国人口不过五六千万。因此开元天宝年间物价非常便宜，青州、齐州一带斗米五文而已（转引自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下册）。当时另两个世界强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和首都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所以历史学家称“隋、唐皇朝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中国通史第六卷上 500 页）因此最重要的是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朝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康雍乾时代和汉朝唐朝的主要差距还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和精神。

汉唐之所以一直被公认为盛世，并不仅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精神生产和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相对地比较开明。刘邦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而且比较粗鲁，爱骂人，但他为汉王时就很注意纳谏，所以萧何将逃跑的韩信追回能拜为大将军。刘邦称帝后陆贾等文人常常引用《诗》、《书》的文字劝说刘邦，刘邦烦了，骂道：“乃公（你爷爷）居马上而得之（天下），安事

（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就毫不客气地反驳说 “居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怎么能靠）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面有愧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结果陆贾连续上了十二篇治国方略的奏章，刘邦每看一篇都说好，这就是著名的《新语》十二篇。东汉前期也还较多地保持着这种状态，整个社会洋溢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所以班超才会不甘心于抄抄写写，投笔从戎。知识分子中洋溢着一种大丈夫气概，就是班超所说的“壮士志”。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到武则天到玄宗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杜甫诗以赞扬的语气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甚至是灭九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祸及。戴逸先生在《怎样》一文中说我“此话未免言过其实”，理由是不但“清前期书香门第，读书人家一般都会有李杜诗集，我们从未听说谁家因藏有李杜诗集而遭灭族或连坐之灾，相反乾隆皇帝……诗文中对李杜的诗更是一片赞扬……如果杜甫生于当代，乾隆皇帝愿意鞠躬拜倒。”我看未必。乾隆皇帝对生活在一千年前已经不会对他构成威胁的李白杜甫可以“一片赞扬”，“当拜下风”，“鞠躬拜倒”，但是决不会容忍他当皇帝的时候居然有这样藐视皇帝召唤的文人，也不会允许有人藏有这种对当朝皇帝大逆之作。我说“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李白杜甫如何如何，就是指李白杜甫如果生活在康雍乾三朝时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而不是李白杜甫的诗在一千年后的康雍乾之世的待遇。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年纪轻轻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豪迈、自信！有清一代找不出一个李白这样的人来。我们在唐诗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充满进取精神、昂扬斗志和开放意识的大唐气象，大唐精神。清朝整整二百年没有一点豪迈之气，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 20 世纪初才出现一些有气魄的作品，但那是忧国忧民，充满了悲愤之情。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些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二、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历史性失误

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中批评我没有对他提出“盛世”的条件进行反驳，那是因为当时我不愿把文章写得太长之故。所以现在我只好就此问题多说几句。戴先生说：“盛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康雍乾三朝在国家统一方面的伟大历史性贡献我前面已经讲了，现在着重谈谈另外四个条件。

要想正确评价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应当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总座标之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中指出，“（公元）1500 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而在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498 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找到通往印度的航路， 1520 年麦哲伦从大西洋来到太平洋。所以“直到 1500 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因此 1500 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广大研究世界史学者的共识。

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之后的中国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将后来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都归咎于康雍乾三帝，因此首先要从公元 1500 年前后的明朝中后期说起。无独有偶，著名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选择了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的许多细节来对当时的中国进行解剖。黄仁宇以大量事实证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明朝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弊病如果和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整体实力遥遥领先，而欧洲则刚刚起步，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动乱、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然， 1644 年清朝在北京正式代替明朝以后，中国也完全来得及。但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使中国失去了整整两百五十年！而这里关键的就是康雍乾三朝的一百三十四年。

戴逸先生说：“统一之后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利益不

同，思想观念更不同。这就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统一管理。而加强中央权力，实际上就加强了皇帝的个人权力，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使对今日也是任何一个大国不可避免的，将它作为“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理由，进而似乎“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也有了合理性，实难令人信服。戴逸先生在答我的文章中说：“只有认真研究产生这种制度的原因，才能找到铲除它的办法。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经济和又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这才是根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残余的正确途径。”此说需要商榷，因为产生封建专制制度和这种制度在某个朝代长期恶性发展，并不是一回事。铲除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固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基础薄弱就只能“发展生产”等等，就只能加强本来已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何况正如戴逸先生《怎样》一文中所言，康雍乾时期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实际上我对康雍乾三朝评价提出异议，并不涉及是否“铲除”或“根除”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革命问题，只不过是觉得评价过高罢了。

戴逸先生认为，“在制度上康雍乾盛世的制度创新意义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作用明显。这是封建专制”此说我不赞成。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三朝在改土归流等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改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戴先生十分肯定的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贴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这种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病在乾隆中后期已经越来越明显，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珅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数十年而无法揭露，就是一个显例。因为身为大学士的和珅只是对乾隆一个人负责，只要乾隆继续宠幸他，那就谁也奈何他不得。甚至连当上皇帝的嘉庆对他都没有办法，因为乾隆虽然禅位给了儿子，可乾隆还是太上皇呢。直到乾隆一死，嘉庆立即逮捕和珅，并且赐死。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舰船本身和军官素质上毫不亚于日本，却全军覆没，即为铁证。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阴影”主要是四个方面，且将“闭关锁国”置于“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之前。我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度的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而且这三个问题由来已久。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农轻商，轻视自然科学，只不过各个朝代程度略有不同罢了。至于闭关锁国，明朝前期就开始了。因此这三个方面都不是清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特有的问题。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一文中说：“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在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锢，也有书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祸。而且后来八股取士，这就要求不但在考试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完全按照朝廷的严格规定行事。问题是清朝的文字狱比秦汉、比明朝要严重广泛得多得多，时间也长得多。不但规定苛刻，而且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康雍乾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残酷，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讳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时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轻则降职，重则甚至处斩。康熙五十年（1711）已经“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序者绞刑。过了两年，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刻者和看过此书而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多达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又的尚书、御史等京官三十二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而是全民性的灾难与恐惧。康雍乾三帝严厉处置“失察”官员这一招非常厉害。所以文字狱本身牵涉的人虽然有限，无非是几千人，但是由于各级官员都深怕由于自己失察而被杀或者丢官、降级，所以无不变本加厉地在各地严厉禁止一切对朝廷有一丝一毫触犯的文字和言行，于是整个民族自然就变得万马齐喑了。

雍正处死他最倚重的大将军年羹尧，主要把柄之一也是文

字。雍正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年还在年羹尧的折子上批道：“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之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久矣

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仅仅过了几个月，雍正三年二月，天空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年羹尧也和群臣一样上疏贺此大吉大利之象。疏中用了“夕惕朝乾”四字，此语出于《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年羹尧本系奉承雍正整天都在自强不息、小心谨慎地为国操劳。此语通常作“朝乾夕惕”，是个并列结构，前后互换并不影响原意。汉语中类似词语颇多，如“柳暗花明”、“三教九流”，不胜枚举。雍正却说他有意倒置，心怀叵测。“羹尧不以　朝乾夕惕　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清史稿　本传》)。后来这位助他夺得帝位的左膀右臂被捕回京，定罪多达九十二款，其中斩罪三十余条。年羹尧在狱中上奏哀求：“留下这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恩准”其于狱中自尽，其子年富被斩，其他十五以上诸子发边充军。雍正六年（　　发生了曾静企图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事件，曾静被捕，招供说自己受了吕留良著作的影响。此时不但吕留良已死　年，连其子吕葆中也已故。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吕葆中均开棺戮尸，另一子吕毅中斩首。其余兄弟、伯叔、妻妾、女儿、以及兄弟之子女妻妾等均受牵连被一一治罪。吕留良已死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示，严的门人沈在宽以及刊刻和私藏吕留良著作的四人均被斩首，还有一些吕留良的门徒被革去功名，连同妻、子发配三千里外，另有门徒十余人被责打一百大板。吕留良一切著作均被禁毁。

乾隆朝历来被认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此时清朝[illegible]

其所炯戒。”于是王肇基被押赴城内交通要道以杖活活打死。

如果在文字中不小心写到康雍乾三帝的名字，即所谓犯了名讳，就有杀头之罪。江西举人王锡侯因编字典《字贯》被处死就是一个显例。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上谕道：“竟有一篇，将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结果王锡侯“从宽”立斩，三个儿子四个孙子皆斩监候秋决（秋后处决）。由于“失察”，江西巡抚海成也斩监候，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江西第二、三把手从二品的布政使与正三品的按察使俱降级为正五品的同知。河南民人刘峨刊刻了一本专门卖给考生讲避讳的书，告诉考生什么字应当避讳，怎么避讳。这样自然就必须把皇帝的名字刻出来，结果竟被斩首！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不是文人的普通老百姓也因有禁书而被杀。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四十七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十五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即使有些已死多年者也被开棺戮尸，澹归和尚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澹归（1614—1680）俗姓金，名堡，浙江杭州人。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做过知州。明亡后金堡曾参加抗清义军，失败后出家为僧，在广东韶州（韶关）辟丹霞寺住持。他死后将近一百年的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亲自审阅各地呈缴来的应禁书籍时，发现澹归和尚的《偏行堂集》“诗文中多悖谬字句”。该书为当年的韶州知府高纲募集资金刊刻并作序。由于高纲已死多年，乾隆降诏，将其子孙多人捉拿交刑部治罪，各人家中查抄。澹归一切著作均彻底销毁，丹霞寺内所有澹归的碑刻全部推倒打碎，埋骨之塔刨毁，寺僧死者一说三百余人，一说五百余人。总之，乾隆朝文字狱打击面大大扩大，已不仅限于文人，还有各种老百姓，包括老板、江湖郎中、算命先生、轿夫、农民、帮工。

姚小平先生说：”卷入文字狱的以底层普通读书人居多，中层次之，高层尤少。”（《也谈康乾盛世》中华读书报 2002 年 8 月 28 日，以下简称（也谈））这个说法并不全面。有些文人身居高位，深知文字狱的恐怖，极为小心谨慎。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直接因文字罹祸者不多，但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惧，他们在文字和言行上都极其胆小怕事。我们只要看看乾隆特别宠幸的重臣张廷玉（1672—1755）的遭遇就能明白。《清史稿》列传七十

五说：“张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他历任康熙朝末年内阁学士（清初正三品，雍正八年定从二品）、刑部侍郎（品级同上）。雍正朝先后授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位同宰相，雍正八年并定正一品）兼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少保，为新设立的军机处三位军机大臣之一。乾隆四年进三等伯，加太保，开清朝文臣无爵至侯伯先例。他年过七十多次请求致仕（退休）不准。这位三朝元老可谓位极人臣，显赫无比。但是他再“周敏谨慎”也总有想不周全之处，结果差一点惹了大祸。他七十八岁获准致仕后奏请乾隆，说先帝（雍正）曾有遗命许他死后配享太庙，他怕将来不能兑现，请求乾隆给句话。这不是对皇帝不信任么！乾隆很不高兴，不过还是颁诏重申雍正遗命，并写诗示意。第二天乾隆见张廷玉自己没有亲自来谢恩而是派儿子上殿，大怒，降旨斥责，削去伯爵。第二年乾隆的皇长子死了，才初祭时张廷玉就请求回老家安徽桐城，乾隆更加愤怒。后来张廷玉举荐的一个姻亲犯罪，乾隆抓住把柄责备张廷玉，并“命尽缴历年班赐诸物”。虽然张廷玉死后还是配享太庙，但这只不过是乾隆遵父皇雍正的遗命罢了。由于文网实在过于严密，许多高层文人仍然躲不过文字狱的灾难。沈德潜（1673—1769）少时即以诗名，但举业不顺，六十七岁方中进士。乾隆爱写诗，有时命沈德潜属和，甚至请他代作。沈德潜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致仕后先后加礼部尚书衔和太子太傅（从一品），“入朝赐杖”，回到故乡苏州后乾隆还为他的诗文集写序。九十七岁去世，乾隆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也可谓生前身后备极荣耀。沈德潜死后九年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集》被人检举“有悖逆语”，主要罪状之一是引用了吕留良（1629—1683）的话，乾隆还发现徐述夔有的诗可能有影射，其中最有名的是《鹤立鸡群》诗中有“明朝期振翮（hé 鸟羽茎，振翮意高飞），一举去清都”两句。原诗咏鹤，期望来日高飞到天廷，其实反映了作者科举高中和入朝为官的愿望。但“朝”可读作 cháo 和 zhāo，有两解。“去”可解作去往，也可解作去除，那样就变成兴明去清了。乾隆上谕说：此诗“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而此集子前有沈德潜写的传，说徐述夔“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乾隆非常生气，“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磨毁移弃）其墓碑。”（《清史稿》列传九十二）还命江苏巡抚杨魁亲自到沈德潜

家中将以前赏赐给他的“墨宝诗章碑帖”及木杖、坐褥、寿佛等统统收回。因此所谓“文字狱并未涉及到高层知识分子和学界名流”并不正确。连张廷玉、沈德潜这样备受乾隆皇帝恩宠的大臣都如此火烛小心，只要一不留神就会大祸临头，其他臣工的谨小慎微就不必说了。整个朝廷上上下下都是这样一种精神萎靡不振的状态，有谁还敢对皇帝提出任何不中听的意见？自然只有迎合了，这样的朝代还说它是“盛世”，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盛世”的标准中应该有民族精神振奋这样一个重要指标才是。

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朝，不但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1774—1782）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二十四次。乾隆一朝，全国禁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lie，相等）”（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因此在西方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一直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彻底被扼杀。中国官场过去就等级森严，“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至清代尤甚，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唯唯喏喏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乾隆四十七年进士，嘉庆、道光时代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1755—1835），别人问这位三朝重臣的为官之道，他说，“无他，多磕头，少说话耳。”大学士就是宰相哪！连宰相都吓得只知道“多磕头，少说话”，这种卑躬屈膝之徒居然能够当上宰相，这样的时代现在还称作“盛世”，我不赞成。

中国落后于西方自然并非自清代始，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明朝的失误。但是明朝的思想比清朝活跃得多，出现了不少进步思想家。明代中期的王阳明（1472—1528）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提倡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李贽（1527—1602）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主张重视功利。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夫妇论》）。他还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尽管李贽被捕入狱，被迫以自杀抗议，但是毕竟不像康雍乾时期那样灭几族。李贽的书在当时被禁，但是

一直有人在不断重印。这在康雍乾时代根本不可能，重印者也要处死或灭门。明朝后期的具有改革意识的东林党人反对宦官专权，反对矿监税使对城市工商业者的严重掠夺和贵族无限占有土地。尽管受到宦官的残酷镇压，许多东林党人被杀，但是毕竟不像康雍乾三朝那样斩尽杀绝，诛灭几族。因此东林党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明末至清康熙中期的黄宗羲(1610—1695)竟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强调"工商皆本"。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两百多年！

在康雍乾之际，列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用坚船利炮威胁中国。如果不是由于康雍乾三帝的严重失误，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才资源，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迎头赶上。戴逸先生说我的"这个愿望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不是某个人的严重失误造成的"，不能"把个人的作用看得很大"(《怎样》)。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可不是一般人，是独揽军国大权不受任何制约可以对全国臣民生杀予夺的皇帝，而且掌权长达134年，我们不能不把他们的"个人作用看得很大"。比康熙朝晚一百五十年比乾隆朝末期还要晚七十年的于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即为一例。1662—1796年的康雍乾之世国外出现了许多改变世界面貌大大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进展和重大发明。牛顿(1642—1727)于1687年在其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1753年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并将它发展为电学理论。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气机。1781年卡文迪什证明水是由两份氢和一份氧组成……往往被我们忽视的还有，就在康熙登基之时166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已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鼓励并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以搜集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四年以后，即1666年一个科学院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批准下成立。接着，在欧洲其他国家一些相似的学会也相继成立。[3]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重大科学技术发明的中国人，有清一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中在自然科学技术方

面不仅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连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都直到 19 世纪末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时才高涨起来？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当时科学家在西方大量涌现，其实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大量产生思想家。而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则根本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会有思想家，因而也就不会有科学家了。姚小平先生说：“要说‘解放思想’，‘接受新知’，康熙已经在这样做了。”康熙确实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哲学、医学等知识很有兴趣，但是作为皇帝，他不但没有提倡广大臣工也来学习，而且他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他曾说：“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他组织编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为之作序，目的都是为了“讲求治道”。正如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说：“现今中国，人们把道德、哲学视为主要学问，却极端忽视了哲学以外的其他学问。”他说康熙皇帝“长期研究中国古籍，完全领会了儒教的精神”，是当代中国“儒教的教祖”（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8 册 178—180 页）。由此可见康熙的“接受新知”只停留在兴趣层面，丝毫没有成为帝王“治道”的一部分，因而康熙远远没有达到“解放思想”的高度。

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当时的中国属于表面繁荣而实质停滞，西方则暂时还贫困却在迅速发展。[5]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繁荣是由于过去进步而在吃老本，或者说暂时还有老本可吃，它内在的先进性却已经消失，因而社会发展停滞。而西方因过去落后造成的贫困却由于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正在迅速改变。戴逸先生引用美国学者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关于“18 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欧洲也才百分之二十三”，并不能证明“从横向来看，康雍乾盛世都是一个非常繁荣发展的时代”。戴逸先生说：“康雍乾盛世，中国国力世界第一，但这只是生产总量第一，而非人均。”戴先生显然是将“国力”（现通称“综合国力”）与 GDP （国民生产总值）甚至“工业产量、生产总量”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国力”的构成因素比 GDP 要复杂得多得多，工业产量、生产总量或是 GDP 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远非一事。康雍乾之世的经济“繁荣”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明末以来长期战乱之后的恢复性发展。因为康雍乾时期的经济没

有任何新的素质。而欧洲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带动的新型工业，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根本方面都比康雍乾的清朝先进得多，因此它所具备的综合国力实际上要远远大于 GDP。在整个欧洲刚刚开始走向资本主义时，康雍乾时期的中国由于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总量确实很高。但由于生产关系落后和根本没有任何机器大生产，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欧洲，实际上综合国力已经比欧洲差了一大截。中国由于人口远多于欧洲而形成的经济总量上的暂时优势，不久便荡然无存，迅速被欧洲超过并被远远甩在后面。戴逸先生针对我上面这段话说，“周先生在这里把时间弄错了，肯尼迪书中的统计数字明确指的是 1750 年，还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前夕。无论欧洲还是中国都处在手工业生产时代，并没有大机器与工厂制度，因而也不存在周思源先生所说‘比清朝先进得多’的欧洲工业。”(《怎样》)英国产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恩格斯等都把它定在 1760 年”，有不少学者认为“开始于 1780 年代……其实，工业革命是由一系列生产技术的创造革新和社会关系的变动所构成的，很难说哪一个年代可以作为它的开始的绝对标志。”有些学者“把它的开始定在 18 世纪后半期。”（蒋梦引主编《英国史》 422 页）我是将康雍乾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18 世纪后半期正处于乾隆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虽然是在 18 世纪后半期，即乾隆中后期，但是酝酿则早得多，时间也长得多，正好处于康雍乾三朝，在时间上没有错。何况我是把欧洲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放在一起来讲这个问题的，商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要早于工业革命。而原来手工业比英国发达得多的中国康雍乾时期却丝毫没有动静。正是由于严酷的思想压制，明朝后期已经出现的重视工商业的呼声未能得到张扬，从而堵塞了中国前进的道路。

GDP 无论是总量或人均都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但是过于强调 GDP 的作用是不行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只要看看中东力量对比就可以了。综合国力究竟如何，不完全取决于 GDP。20 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正处于文革时期的中国的 GDP 在世界上很低，由于中国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核武器和中远程运载工具，尽管两弹一星从 GDP 角度计算微不足道，但在提高综合国力上的贡献惊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谁也不敢小觑。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强调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